



“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 中美联合抗击日本空战纪实  
二战名将回忆录 FAMOUS WORLD WAR II MEMOIRS

# WAY OF A FIGHTER

[美] 陈纳德◎著  
曹磊◎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战士之路





WAY OF A FIGHTER

# 战士之路

「美」克莱尔·李·陈纳德◎著

曹磊◎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士之路 / (美) 陈纳德 著; 曹磊 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87-4593-1

I. ①战… II. ①陈… ②曹… III. ①陈纳德, C.L. (1890~1958) — 自传 IV. ①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7031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战士之路

[美] 克莱尔·李·陈纳德 著 曹磊 译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http://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35千字 印张 / 22

版次 / 2014年10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45.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第一章

我的中国岁月其实始自阿肯色州的一张病床。1937年春天，我结束了在陆军航空队20年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带着低血压、听力减弱，外加精神抑郁之类的慢性病，来到位于温泉城的陆海军总医院休养。那时的我马上就要47岁了，由于疾病缠身，已经获准提前退役。然而不到4个月之后，我就重披战袍，在中日战争的硝烟之中，越过日军高射炮和战斗机的封锁，飞临上海上空。

这次人生转折的让我实现了我长久以来的职业梦想。终其一生，我始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可是在过去的飞行生涯中，我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我的先辈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1778年，他们离开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跟随拉法耶特将军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战后，他们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定居。后来，他们的后代又曾经在田纳西、密西西比，以及路易斯安那等地居住。就在路易斯安那州，1842年，我的祖父买下了一块面积300英亩<sup>①</sup>的农场种植棉花，并组建了一个大家庭。西进运动时期，我的家族和得克萨斯州的开拓者山姆·休斯敦结了亲，他的母亲是我祖母的亲姐妹。我的母亲杰西·李和罗伯特·李将军<sup>②</sup>沾亲，她的父亲威廉·罗尔斯·李博士是当时在弗吉尼亚军团服务的外科医生。

尽管1890年出生在得克萨斯的科莫斯，我关于人生的最初记忆却是路易斯安

---

① 1英亩=4046.8564224平方米。——译者注

② 美国内战时期南军总司令。——译者注

那西南部广袤的橡树林和布满苔藓的沼泽。即便是在今天，那里依然保持着原始、质朴的野性。面积有限的人工棉田周围，狼群、灰熊、野鹿、火鸡，偶尔还有豹子之类的野生动物仍然在茂密的丛林中游荡、欢唱。

我的母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父亲约翰·斯托维尔·陈纳德则活到了80岁高龄。他很理解一个男孩子对森林的强烈好奇心，允许我在里面四处漫游。有好几次，我只带着一点烤鱼用的咸肉和做面包用的玉米，就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星期。胜利归来的我，总可以为家人带去说不尽的逸闻奇事。在森林里，为了吃饭，我学会了打猎。这种对打猎的热情伴随我一生。8岁的时候，我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支枪，那是一支温彻斯特步枪。在此之前，我就已经依靠自己的猎狗打到了成堆的田鼠、负鼠和臭鼬。成年之后，我又在世界各地打过猎、钓过鱼，却始终没有忘记儿时腾萨斯的那条大河。即便是在这个秋天，身处中国都市喧嚣中的我，耳边似乎仍然回荡着森林中公鹿狂奔时的雄壮之声。在过去的10年中，只要回到美国，哪怕只逗留很短的时间，我也要回路易斯安那的河边看看，钓一会儿鱼。我认为，那些仅仅因为畏惧冬日严寒而放弃这项娱乐的人是可悲的，因为他们错过了用猪肉鱼饵钓大鲈鱼的最好时机。

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林中和水边的生活帮助我养成了自信、独立的个性，迫使我给自己拿主意。就这样，我长到了12岁。长年狩猎、钓鱼的生活让我习惯了独处。尚且年幼的我还无法加入成人的社交圈，可是丛林生活获得的丰富阅历又令我不屑于和同龄的孩子相处。于是，我只好自己露营，自己打猎，自己野餐，享受着丛林里的孤独时光。

我10岁的时候，父亲又结了婚。新娘名叫洛蒂·伯纳斯，是我就读的吉尔伯特中学的老师。父亲的这个选择再明智不过了，因为我和继母，也是我的老师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继母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卡尔霍恩附近的一片农场，她也很喜欢大自然。在和父亲结婚之前，我们就曾经一起骑马、散步、野餐。继母鼓励我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还鼓励我始终保持进取的欲望。在她看来，仅仅在同龄人圈子中拥有一个最出色的猎人和渔夫的头衔，对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她要求我在学业方面也要做得同样出色。尽管继母在和父亲结婚5年之后就去世了，然而在我和父亲心中，她都是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伴侣。她去世那年，我刚

刚15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遇到这样一位能够获得我毫无保留的钦佩、尊重和热爱朋友。

童年时代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继母无微不至的爱怜，使我养成了与同时代人迥然有异的独特个性，有时候甚至显得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尽管最终并没有走上自闭、反社会的极端道路，不过独立、倔强的个性却让我在面对那些年龄大一些男孩的时候，显得不那么顺从，往往拒绝服从他们的权威。于是，我不得不经常和他或他们拳脚相向，最终让他或他们对我俯首帖耳。实力不凡的我很快就在男孩圈子里树立了威信，还经常扮演矛盾仲裁人的角色。这完全是出自一种潜意识的冲动，我总是要把事情做到最好。我要求自己必须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游得更猛，潜得更深，钓最大的鱼，打最多的猎物，做更多的农活，读更多的书，还要在功课方面门门优秀。总之，就是要全方位地超越自己的同龄人。中学时代的我参加了棒球队、篮球队，还在橄榄球队担任四分卫。但无论干什么事，只要当了第二，没拿到第一，我就会认为是自己输了。我将荣誉视为生命，对周围人的议论很在意，而且从不向年长者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我拥有强烈的求胜欲望和领导欲望，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总是好为人师地指教那些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在行的队友。可是一旦取得胜利，我又能对到手的荣誉淡然处之。

年少时代的我在生理、心理方面的养成都是非常出色的。我总是可以很容易地适应环境，对周围的情况做出判断，制订相应的计划，然后及时采取行动。对于那些跟不上我节奏的人，我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在后来和上级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因这样的个性和他们造成了很多不愉快，因为我总是懒得向他们详细说明自己的计划。当军令难违、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故意把问题说得很复杂，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独揽大权，自行其是。

当我还在中学就读的时候，就已经从祖父的藏书了解了伯罗奔尼撒战争<sup>①</sup>和布匿战争<sup>②</sup>。尽管那时的我对希腊、迦太基、罗马这些古代国家所知甚少，却依然

---

① 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译者注

②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译者注

被温泉关战役，扎马战役，坎尼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彩图中冲锋的战象，全副武装的战士，还有燃烧的战船迷住了。

我在历史、地理和数学方面天分很高，读起这些书来，就像其他孩子读童话故事一样如饥似渴。进入中学以后，我经常把暑假当成自己的第三个学期，全部用来读这些专业书籍。勤学苦练的我在13岁之前就修完了吉尔伯特中学的10年制课程，却不得不继续留校就读一年，因为当时的我年龄尚小，还不能被大学录取。历史领域的广泛涉猎使我不知不觉地接近了《圣经》，并在很小的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1岁那年，我接受洗礼，成为浸礼派教徒。

我第一次接触军事领域，是在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录取那年。那年，我成为该校农学专业的新生。实话实说，我对种田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可是在吉尔伯特中学就读的经历，再加上那一年额外的留校时间却让我只能报考这所大学的这个专业。于是，14岁的我只好和许多同伴一起，走进了像军营一样被五边形砖墙包围着的校园，见识了它闻名遐迩的军事化管理。

入校之后没几天，我就从一位冒充当天值日官的学长那里，领教了新生的“必修课”。那天，我被这位假冒的值日官从宿舍叫了过去，得到了一把上刺刀的步枪。我的具体任务是在学校大门那儿来回巡逻，禁止人员出入，除非他们持有值日官签发的通行证。正当我在校门口执勤的时候，几位学长从边上建筑物的二楼窗口朝我兜头泼了一桶凉水。尽管胸中的怒火已经可以把身上的水滴蒸发掉了，我却没有理会他们，继续执勤。午饭铃响起的时候，我坚守着岗位，却在心里打定主意准备报复他们。学长们从楼上蜂拥而下，直奔食堂，却遇到了我的刺刀，以及刺刀后面愤怒的眼神。整个下午过去了，学长们原先的快乐已经被没吃午饭的焦灼所取代，却没人敢来和我打个照面。最终，他们找来了真正的值日官。值日官解除了我的勤务，也把学长们从饥饿的折磨中解救了出来。

不久之后，我向西点军校和印第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同时提交了入学申请。1909年，我如期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参加入学考试。那所学校灰色的围墙，以及校园里压抑的气氛着实打击了我梦想成为一名海军上将的热情。两天的紧张考试之后，我反复在内心深处提醒自己，要想成为一名水兵，就必须在这所学校待上两年。两年灰墙后面的刻板生活，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在路易斯安那的

旷野上自由地度过整个夏天的小伙子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于是，我在最后一门考试的时候交了白卷。这之后，我打电报通知父亲自己没能通过考试，然后就坐火车回了路易斯安那。

置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军事化生活中的我始终被去腾萨斯河边钓鱼的渴望干扰着。要知道，钓鱼的最佳时机是在初夏。可是等到学校放暑假的时候，这个最佳时机就已经过去了。渴望钓鱼的我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每个学期，我都会有意犯一些小错，得到记过。这些记过积累起来刚好可以在我结束期末考试、拿到学分之后，被学校处以停课的处罚。于是，我就可以提前回家，在腾萨斯河边争取到宝贵的一周。当然，秋天开学的时候，我总会因为这些记过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好在我的成绩不错，我的叔叔尼尔森又是州里知名的教授，所以我最后总能得到学校的宽恕。

有一年，我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临近期末的时候，我的记过没有攒够，仍差3次。为了实现预期目标，原本对酒还没什么兴趣的我决定和同学一起违反校规，痛饮一番，顺便补齐欠缺的3次记过。于是，我翻墙出去，来到一家名为“巴吞鲁日”的酒馆，为大家买了满满一桶冒着泡沫的啤酒，然后躲过学校的警卫，把酒带进了校园。畅饮之后，我又主动找到警卫“投案自首”，让他去报告我的违纪行为。

还有一次，为了得到记过，我特意趁全体学生集合的时候把裤腿卷了起来。于是，教官把站在后排的我揪到大家面前示众，还断言说：“陈纳德，你永远也成不了一个真正的士兵。”

有意思的是，我从一位名叫萨蒙的上尉那里也得到过类似的评价。这个人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就是他签署了禁止我接受飞行训练的文件，理由是“该申请者不具备成为一名飞行员的起码素质”。

萨蒙上尉恐怕绝对没有想到，我后来会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1910年路易斯安那商品交易会上，一架摇摇晃晃划过天际的寇蒂斯飞机燃起了我的飞行热情。像很多年轻人那样，我渴望探索未知的世界，却又只能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以至于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被别人抢了先。天空中那架摇摇晃晃的飞机总算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在我的心中播撒下了渴望飞行的种子。话虽如此，这颗种子

真正开花结果也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我成为一名飞行员的前景始终非常暗淡。

为了在毕业之后谋取一个教职，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师范学校度过的。毕业之后，我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只有一间教室、生源几乎都是超龄农家子弟的乡村中学找到了一个教师职位。对于任何一位老师来说，这个工作都无异于噩梦，几乎没有人能坚持超过一个学期。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对学生的不敬和调皮具有更强的容忍度。要知道，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年龄比我还大。为了履行职责，我不得时常把这些“大爷”集中起来，在学校后面的空地上搞思想教育，有时候还不得不骂几句娘。第二年，为了帮助学生们发泄过剩的精力，我组织他们成立了一支棒球队。这支球队在全路易斯安那所向无敌。为人师表的我也经常耐不住性子，赤膊上阵。观众们根本分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尽管这份工作的薪水十分微薄，我还是逐渐喜欢上了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每年春天的时候都要给学生放农忙假，直到秋收之后才开学。于是，我就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用来打猎和钓鱼了。

后来，我结了婚，又先后有了两个孩子，这令我的手头变得拮据起来。为了谋生，我只好放弃这份工作，来到密西西比州，在一家名为“百乐”的商业学院担任英文教师。不久之后，我又来到路易斯维尔的基督教青年会<sup>①</sup>担任体育助教。1916年的时候，我到了俄亥俄州一家名为“阿克伦”的工厂，为协约国生产汽车轮胎。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之后，我立刻报名参军当飞行员，却反复遭到军方拒绝，理由是当时的我已经26岁，又是3个孩子的父亲，理论上很难适应现代飞行训练。

1917年8月，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录取了我。同年11月，在一群基层军官的带领下，踢了3个月正步的我顺利毕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驻扎在圣安东尼奥特拉维斯堡的第90师任职。那座城市边上有一处被棉花地包围着的名叫“凯利庄园”的地方，陆军航空队正在那里使用一种现在被称为“杰尼（柯

---

<sup>①</sup> 即YMCA，基督教青年会是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已具有160多年的历史。——译者注

蒂斯JN-4型)的老式帆布木制飞机训练飞行员。人手不足的他们打算从现役军官中征召志愿者,怀揣飞行梦想的我立刻欣然前往。遗憾的是,我的工作只是为那些在圣安东尼奥接受初级军事训练的飞行员们喊口令。就这样,我在“凯利庄园”混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尽管这期间训练基地的指挥官至少3次拒绝了我参加飞行训练的申请,可我还是偷偷学会了驾驶飞机。

为了学习飞行,我成功利用了“凯利庄园”的管理混乱,四处偷师学艺。一位名叫查理·莱蒙德的资深教官自愿指导我飞行;年轻的飞行员、陆军中尉拉尔夫则为我提供训练必需的飞机。每当我打算偷偷训练的时候,他都会用自己的名义把飞机开出来,然后再交给我驾驶。除此之外,一位名叫王林的机械维修方面的负责人还有意给我安排了检查进出机场的飞机的工作。我的任务是登记这些飞机的飞行时间,以便定期维护。于是,我就有机会趁周围没人的时候,开一会儿飞机。

对于当时的陆军<sup>①</sup>来说,飞行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方面的规章制度因此很不完善,方便了我的各种钻空子行为。有一次,打算偷偷度个假的我甚至把飞机开到了达拉斯,并且当了一个星期的逃兵。这期间,根本没人想起我和这架飞机。还有一次,一位手头不太宽裕的飞行员干脆趁大家午餐的时候,偷走了一架飞机。他后来把飞机开到了布鲁克斯农场,并藏在一个大水罐的后面。有意思的是,等到检察官准备对他的罪行进行起诉的时候,却发现根本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条文。

1918年秋天,我来到位于长岛的米切尔基地,作为第46战斗机中队的副官,准备渡海前往法国。同年10月的一个下雨天,我们带着包括折叠脸盆在内的全套野营装备,穿过米尼奥拉平原,坐火车前往戈登市,准备登船。走到半路的时候,火车又突然停下,调头开了回去。因为就在那天,停战协定正式生效,所有的海外军事运输都奉命停了下来。

返回米切尔基地之后,很快来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所有南方军官前去镇压

---

① 美国“二战”结束前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译者注

一支正在弗吉尼亚州扩建兰利机场（这个地方靠近切萨皮克湾的沼泽地区）的黑人工程部队的哗变。好在哗变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我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兰利机场一带的具体情况。不幸的是，致命的流感又开始闹腾了起来。患病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致机场的机库都被腾了出来，充当大批被感染官兵的病房。得了病的我被送进一个装着102名病人的机库。在那里，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医生却毫无办法。后来，病情严重的我被送进一间专门留给垂死者的小屋子等死。我记得，躺在我边上那张病床上的军官第二天早上就死了。我还记得，曾经有医生和护士来为这个不幸的家伙检查，然后派人把他抬了出去。这之后，医生告诉护士把门锁上。

护士反对说：“可这儿还有一个没死的呢。”

“他到不了明天早上，”医生回答，“锁门吧。”

第二天早上，我还活着，可是已经离死不远了。真正救了我命的，是我的好朋友拉尔夫中尉。他从凯利机场专门赶来，协助负责兰利机场的保卫工作。这家伙随身还带了一大壶从走私者那儿缴获过来的朗姆酒（这种酒很快就在切萨皮克湾地区流行了起来）。正是拉尔夫给我灌下的1/4公升烈酒，让我最终恢复过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病愈不久的我终于接到了飞行学校的录取通知。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圣安东尼奥接受训练，却在几个月之后得到消息说拉尔夫在一次武装冲突中阵亡了。

返回凯利机场的我第一次合法地驾驶飞机飞行，这令我兴奋不已。由于在此之前我已经有了80个小时的“私自”飞行记录，养成了一些坏习惯。这让我在得到正规专业指导的时候，经常觉得很别扭。不幸的是，我的飞行教官和我一样，是个火暴脾气。这位教官有个坏习惯，就是当学员犯错误的时候从不耐烦讲解，而是把他晾在一边，直接代替学员驾驶飞机，以此表达自己的愤怒。有过这么几次经历之后，怒不可遏的我向教官明确表示，如果他再这么干，我就彻底拒绝驾驶，直接让他来开算了。我这么说了，也这么干了。有一次，我们正在一片玉米地练习迫降。我驾驶飞机边滑行边减速，可是教官再次越过我直接操纵了飞机。于是，我说到做到，彻底放弃了驾驶，任由飞机向下坠落。教官以为我意思意思就会恢复驾驶，可是我打定主意，任凭飞机带着呼啸声冲向地面。最终，教官在

我们的飞机已经碰到玉米梢头的时候，重新把飞机拉了起来。这件事情终于让他意识到，我是个比他更倔的人。等我们安全降落之后，这家伙已经被吓得腿软，根本没法跑着去找长官告我的状开除我了。

所幸事故调查委员会原谅了我，并重新指定欧内斯特·埃里森担任我的飞行教官。他是位善良又称职的飞行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各种人情世故的了解和对飞机的了解同样出色。来基地之前，埃里森当过很长时间的邮政飞行员，担任过波音公司的试飞员，还在中国航空公司做过飞行员和运营总监。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航空亚洲境内所有航线的负责人。

在我们第一次教学飞行的过程中，埃里森耐心地听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与前任教官的不愉快。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我。一个小时之后，他示意降落，爬出机舱，然后放了我的单飞。对于这所飞行学校的学员们来说，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学校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剔除像我这样的刺儿头学员。

正是在艾利<sup>①</sup>的引导下，我才真正爱上了飞行，爱上了天空。在此之前，我的所谓“飞行”只是一些简单、机械的动作。埃里森教会了我不少高难度技巧，让驾驶飞机的我自由驰骋，好像腾萨斯河里的鲈鱼。然而埃里森自己很少尝试它们，真正对这些技巧着迷的其实是我。我喜欢那种地平线在眼前不断翻转的感觉，喜欢天空和大地的景色好像万花筒一样在眼前交替变换，喜欢倒飞时头朝下的失重感，喜欢人机合一之后的自在轻灵。1919年春天，我学会了埃里森交给我的一切，顺利从航校毕业。此时的我已经无愧战斗机飞行员的头衔了。

1920年春天，我从战时陆军复员，可是那时的我已经对飞行爱入骨髓，再也舍不得抛弃它了。于是，我回到自家的棉花农场，等待自己加入新组建陆军空中勤务部队的申请得到批准。那年秋天，我成了这支1000多人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队伍，就是“二战”时期那支300万人规模的陆军航空队的雏形。

第二年夏天，著名的第一战斗机大队来到了我所驻扎的、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艾灵顿基地。这支队伍在“一战”时期战功赫赫，它的指挥官是卡尔·斯帕茨少

---

① 埃里森的昵称。——译者注

校。少校在后来的“二战”中先后被任命为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轰炸机部队的指挥官，并在战后以上将，美国空军唯一的五星上将是阿诺德的军衔出任了已经成为独立军种的美国空军首任司令。第一战斗机大队主要驾驶法制“斯帕德”S型和英制SE-5战斗机，机身上喷涂着早已在欧洲西线战场扬名立万的星条军徽。第一战斗机大队之所以在“一战”结束后继续使用法制和英制战斗机，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军工企业仍然无法拿出水平相当的产品。这种情况直到1921年才有所改变。

没过多久，我就被安排在第一战斗机大队接受强化训练，随后又被吸收进第九十四战斗机中队服役。后来，我又转到了弗兰克·亨特的麾下。他是一战时期的王牌飞行员，后来成为驻英国的第8战斗机司令部（指挥第8航空队战斗机部队）少将司令官。这个司令部的徽章是一个扔进圈里的帽子图案<sup>①</sup>，不少美国王牌飞行员都曾经在那里服役，其中就包括埃迪·里肯巴克上尉。在第一战斗机大队受训的日子里，与我一起训练的还有乔·坎农，他后来担任过驻意大利第十二航空队的指挥官。<sup>②</sup>

整整4个月时间，我们在得州的天空中跟随第一战斗机大队的老手们学习那些在西线战场上衍生出来的各种战术技巧，比如编队飞行、搜索目标、空中缠斗等。在我看来，这些技巧更像竞技体育，而不是真正的战术。空中缠斗的战术太接近中世纪的骑士对决，却缺少应付现代战争所必需的冷静和理智。在这样的对决中，兵力和火力都被错误地分散使用，明显违背了最基本的战术原则。

作为一群毫无经验的新手，与那些战功卓著的老油子相比，我们仍显得很稚嫩。在一次战术演练中，乔·坎农几乎送了命。事情是这样的，由于认识到向下俯冲翻滚脱离尾随敌机战术动作的先天不足，我建议采用更具攻击力的“伊麦尔曼式筋斗翻转”<sup>③</sup>。主意拿定，有两个人同意和我一起试验。乔·坎农驾驶SE-5负责尾随攻击唐·斯德斯（他后来担任过驻日本的第七航空队司令）和我分别驾驶“斯帕德”飞机。遗憾的是，“斯帕德”飞机的爬升功能本来就不太好，而且斯

---

① 美国拳击场上的规矩，把帽子扔进比赛场地的圈子带有向对方挑战的意味。——译者注

② 我和他并列同班第一。

③ 因首创者德国飞行员伊麦尔曼得名，动作要领是飞机做半筋斗翻转后还原平飞。——译者注

德斯以前从没飞过“伊麦尔曼式筋斗翻转”。

坎农对我们发起俯冲尾随攻击之后，我们便拉起机头，做“伊麦尔曼式筋斗翻转”，悲剧就此发生了。动作做到一半的时候，斯德斯突然改变了主意，直接来了个小翻转后改为平飞。跟在后面的坎农没能及时收住脚，两架飞机的翅膀撞在了一起。一时间，飞机零件满天飞。

斯德斯好歹操纵着受损严重的飞机完成迫降，并且没有受伤。坎农的SE-5却几乎散了架，它从5000英尺（1英尺=0.3048米）的高度直坠下来，一路上还不停地掉零件。那时虽然已经发明了降落伞，但大家根本还从没用过那玩意。坎农就这么掉了下去，直到摔在了地上。我在驾驶飞机返回基地的途中围着坠机现场盘旋了一圈，然后直接通知基地，我们需要灵车而不是救护车。毕竟，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出乎意料的是，坎农不但活了下来，返回基地后还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从救护车上爬了下来，带着折断的肋骨、脱臼的下巴和差不多被毁容的脸，走进医院治疗。

那之后直到1923年奉命驻防夏威夷，我才再次得到了试验新战法的机会。我在夏威夷待了将近3年，负责指挥部署在福特岛卢克机场的第十九战斗机中队。那个岛正好在珍珠港中间，后来被划归海军。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时，那里是日本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

为了彰显我们的好斗精神，第十九中队的飞行员全部都在自己驾驶的MB-3飞机上喷涂了斗鸡图案。这种精神让我们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最出色的一支队伍，同时也是一支动不动就惹是生非的队伍，尤其是在喝了两杯之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最初两年和周围驻扎的海军，以及那些狂热反对飞机的“高炮主义者”的关系处得一直不怎么样。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我们的狂妄势头遭到了严重打击。那次，另外一个中队的军官提议和我们进行440码（1码=0.9141米）游泳接力赛，我们当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可是直到跳进游泳池，大家才发现，原来全中队包括我在内，总共只有3个人能游上超过100码的距离，而且没有一个人参加过类似的接力赛。我们当时骑虎难下，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这个“密西西比渔夫”可以以一敌二。我率先游了第一棒，并且获得了一定的领先优势。这之后，另外两个人在我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我则趁机躺在泳池边抓紧休

息，准备游最后一棒。不幸的是，问题出在了第三棒上。对于那个家伙来说，110码的距离实在有点长。他还没游到一半，就开始全身抽筋，往下沉。于是，我只好放弃比赛，跳进水里把他救了上来。

现在回想起来，驻扎夏威夷的日子可能就是我在陆军航空队度过的最幸福时光了。在那里，我有了自己的第一支团队。对于每个士兵来说，第一支团队就好像初恋情人，虽然后来还可能遇到其他中意的伴侣，但初恋情人在心中的位置是永远无法动摇的。

正是在夏威夷，我迎来了自己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博比，拥有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那时的我身体结实健壮，还按照战斗机飞行员的传统留着浓密的黑色山羊胡，笔挺的白色制服搭配晒成深褐色的面孔，显得英俊又潇洒。那把山羊胡子我一直留到去布鲁克斯机场担任飞行教官时才剃掉。没了胡子的我，着实把学员们吓了一跳。

夏威夷时代的我对飞行的渴望空前绝后，几乎每天都带着自己的中队搞飞行训练，演练各种战术动作。还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夏威夷也实在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当时我们生活中唯一的不和谐音符就是那些“高炮主义者”和海军。“一战”结束后的日子里，“高炮主义者”曾经着实风光过一阵子。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在他们看来，高炮和高射机枪的出现已经让飞机过了时，任何飞机都将在到达目标上空之前被地面火力揍下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还搞过不少试验。当然，试验的条件完全是按照有利于地面火力的标准制定的。例如，他们会让靶机在固定高度保持匀速飞行。出色的高射炮手对付这样的目标当然是小菜一碟，所有的飞行员对他们来说都不在话下。

我之所以对他们这么了解，是因为曾经和阿尔弗雷德·赫根伯格一起驾驶轰炸机为高射炮手拖拽过靶机。阿尔弗雷德·赫根伯格是个出色的飞行员，他在和平时期就因为担任旧金山至夏威夷航线首航的领航员，以及开发出盲降驾驶技术这两项杰出成就，荣获了两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二战”中，他成为我所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的参谋长。战后，阿尔弗雷德·赫根伯格升任少将，负责指挥根据停战协定移驻中国的第十航空队。夏威夷时代，我们经常做的工作就是耐着性子，限高、限速地用轰炸机为高炮部队拖带靶机。到达指定空域之

后，就用一个空中翻转扭断与靶机之间的绳索，然后加大油门开回家，任由高炮对靶机狂射一气。

有一天，恰好赶上第十九中队在瓦胡岛周边担负战备巡逻任务。我们发现，一列沿海岸沙滩布置的高炮正在准备射击由倒霉的赫根伯格拖着来回飞行的白色靶机。心血来潮的我决定为这种花架子式的训练增添点实战气氛，也让那些高射炮手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战争。于是，我晃动机翼，发出指令，命令全中队做出俯冲轰炸高射炮阵地的样子。当我们重新拉起机头的时候，高射炮手已经被吓得四散奔逃。这之后，大家又在100英尺的低空来回飞了几圈，继续吓唬那些惊恐的炮手。我驾驶飞机，专门负责追逐指挥高炮部队的那位上校。当时飞机的高度如此之低，以至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校被晒得黝黑发亮的光头在阳光中熠熠生辉。这家伙实在太可笑了，我忍不住从驾驶舱探出身子，大声地嘲笑他。

我们返回福特岛的时候，机场里早已闹翻了天，上级司令部的电话已经被愤怒的高炮部队打爆了。大家这时才知道，被我们骚扰的那支高炮部队当时正在进行年度射击考核。由于我们的恶作剧，他们得花上几天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状态。

“知道是谁干的吗？”我假装无辜地问。

“不知道。”基地指挥官回答，“不过据高炮部队的上校说，领头的是个长着黑山羊胡子的法国佬。”

虽然因为这次事件被关了一个星期禁闭，不过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若干年后，当我的部队奉命攻击占领中国汉口的日军时，我们正是采用相同方法对付他们的高炮部队的。为了成功轰炸他们重兵布防的军火库，我们首先派出战斗机和装备加农炮的“米切尔”式轰炸机袭扰日军的高炮、探照灯阵地。同时由重型轰炸机跟进，轰炸军用仓库区。

1925年，在和海军举行的联合演习中，我们第一次尝试了编队攻击的战术。按照演习预案，陆军航空队负责防守珍珠港上空，来自海上航母的海军舰载机则扮演攻击的一方。实话实说，驻守珍珠港的部队早在1941年以前其实就很重视来自海上舰载机攻击的问题，并进行过多次演练。只可惜，最终还是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通过实践，我发现要想在空战中保持队形的完整和火力的集中，避免让其演变成瞎打一气的混战状态确实很难。即便是对于当时最疯狂的飞行员来说，要求他们在编队飞行中，紧挨着自己的队友做出各种绕圈、翻滚，以及“伊麦尔曼式筋斗翻转”之类的动作，也仍然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撞机的危险实在太大了。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特意找了两位年纪最大、性格最沉稳的飞行员一起讨论编队飞行的战术。我们的讨论极其认真、严肃，详细到了每个细节。最后，大家胸有成竹，决定实际检验一下讨论取得的成果。经过反复实践，我们最终确定编队攻击的战术在3机编队的作战情况下是可行的，而且也可以应用到更大规模的编队中去。我们把这个成果当作秘密保守，直到后来，才在卢克机场的一次战术演示中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之后，我们中队的的所有飞行员都必须掌握编队作战的技巧，除非他打算在大家面前栽面子。

在那次演习中，我们的编队攻击战术确实令海军飞行员大吃一惊。一天下午，正在瓦胡岛巡逻的我们发现了一批正准备去“轰炸”珍珠港的“沃特”俯冲轰炸机。有意思的是，他们采取的战术与16年之后的日军非常相似。这些轰炸机随后也发现了我们，却认为我们的高度太低，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于是，这些家伙对我们不理不睬，径直去“轰炸”自己的预定目标了。我们当然不会眼睁睁地把他们放过去。随着我的一声令下，全中队立刻保持编队，整体来了个“伊麦尔曼式筋斗翻转”，占领了海军轰炸机尾部的最佳攻击位置。然后，大家打开节流阀，保持队形从海军轰炸机的编队中穿了过去。这期间，有一名海军飞行员甚至被吓得驾机脱离了编队。幸亏演习规定不允许射击，否则这些“沃特”轰炸机恐怕根本来不及搞清楚是谁在攻击自己，就彻底报销掉了。

演习中，为了尽早发现来袭的“敌军”，我们还尝试建立了最早的防空预警系统。当时的夏威夷还没有预警雷达，我们便因陋就简，采取在一座水塔上设立双人防空哨的方式。这两个人分别配备一架双筒望远镜，背靠背站着，每人负责观察自己面前180度角之内的范围。实践证明，这样的防空哨可以发现6英里（1英里=1609.344米）之外的来袭“敌机”，并及时发出警报，为我们升空迎击争取时间。

一个周六的早上，也就是演习预定结束日期的前一天，水塔上的防空哨发现